



新马华人的 中国观之研究

1949-1965

鲁虎 著





新马华人的 中国观之研究

1949-1965

鲁虎
著



新跃人文丛书

总主编 郭振羽

新马华人的
中国观之研究
1949-1965

阅 览



八方文化创作室

作 者

鲁 虎

企划编辑

潘国驹

责任编辑

冯婉明

封面设计

张 伶

排 版

李丽芳

出 版

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461 Clementi Road, Singapore 599491
www.unisim.edu.sg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发 行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联 络

65-64665775
chpub@wspc.com

印 刷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初 版

2014年9月

国际书号

978-981-4616-28-7 (pbk)

定 价

S\$22

版权所有

新跃大学 八方文化创作室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跃人文丛书

总主编 郭振羽

副总主编 符诗专 罗福腾

丛书编委会委员

- | | |
|-----|-----------------|
| 符诗专 | 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
| 郭振羽 | 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
| 李国英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 罗福腾 | 新加坡新跃大学中文课程 |
| 王润华 |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
| 徐兴无 | 南京大学文学院 |
| 周建渝 |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
| 竺家宁 |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 |

《新跃人文丛书》总序

总主编 郭振羽

《新跃人文丛书》面世了。

这套丛书，是由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组织编辑、由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以“文化中华”为主轴的学术系列专著。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于2012年元月。中心成立的宗旨，就是透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 and 了解。

在研究方面，中心成立伊始，即确定下以“文化中华”为主旨的研究方向；强调不以政治实体或者地理位置来定义“中华”二字，而是以源起于中华大地、流播到五洋七洲的今日华夏文明作为“文化中华”的定位。这么一个“中华”，不是一个局限于地理意义的“中华”。身处世界各个不同角落的炎黄子孙都有自己在地的关注和思考。这样的关注和思考理当受到尊重和珍惜。因为只有这样多元、有容乃大的“中华”，才能在全球化、在地化、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二十一世纪中，让以华文来书写学术文章的学人畅所欲言，进而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样的语境下，《新跃人文丛书》要为“文化中华”的多元性尽一份心、出一点力。除了先期推出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华语应用研究、华文教材研究等专辑外，还有望推出其他研究专辑，包括历史、社会、艺术、戏剧、影视、媒体以及华流时尚等涉及中华人文的

课题。我们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举凡与华夏文明选题有关，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亦或是世界各地华人的的人文现象，都会予以考虑，甄选之后纳入出版规划。

“新跃人文丛书”得以顺利面世，是丛书各分册主编、作者以及出版社编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深知，要出版一套学术研究丛书，从选题的确定、作者的写作到出版发行，每一步骤都需要细心安排，慎重处理。我们感谢编委会委员以及各地学者给予的指导和支持。

《新跃人文丛书》是一片新开发的园地。在这块处女地的土壤下，蕴育各种可能，还有待关心“文化中华”的有心人去挖掘、灌溉、开发。中华文学、语言、教育、历史、社会、艺术、传播、流行文化，与全世界有华人存在的国家、社会的各种在地现象相互磨合、变异所产生出来的可能性是难以想像的。

这样的园地不能仅靠少数人来耕耘。它多元的本质，呼唤着更多各地各界卓有研究成就的学者专家参与。我们真诚期待社会各界的专家、时贤能为这一出版计划出谋划策，共襄此举。

是为序。

2012年10月15日

序一

刘宏

鲁虎博士的专著《新马华人的中国观之研究1949-1965》出版，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

鲁虎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2003年1月开始指导的研究生。他之前在北京大学接受本科、硕士的历史学训练，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东南亚研究，已有较好的专业功底。他放弃稳定的工作职位来国大攻读博士学位，学习目标明确，仍以他喜爱的东南亚历史作为主修方向。鲁虎以求知为乐，勤学好问，积极修课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还特别珍惜现场感受新马历史的机会，常利用周末或假期时间背包外出访古寻幽。

鲁虎的新著来自于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他经过一年的学习准备，确定把新马的中国观作为研究论题。这是新马历史研究有所涉及、但尚未系统、充分探讨的领域。在交流和互动中，与资金、物资、人口等相比，信息、观念、思想同为客观事实，但具有无形的特点，因而在分析时相对更难把握。选题不仅要考察新马巨变时段的方方面面，而且也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有相应的了解。在这点上，鲁虎可谓勇于应对挑战。观念/形象研究，一般可从文化形象学的理论进行，或按照国际关系研究对社会心理学的借鉴着手。鲁虎的研究以他熟悉的历史学因果探讨为基础，参照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结合区域研究、东南亚中国关系、华侨华人、民族主义等已有学术成果，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和思路都颇为自然合理。他在研究资料上肯下扎实的功夫，广泛阅读、搜集中文、英文及部分马来文的文献，从报刊新闻、档案资料、研究著论、个人访谈到广告文字都博取采用，同时本着有一分史料说

一分话的原则，参证辩驳，条陈节论。在鲁虎的研究中，既有宏观的背景、类型、影响概论，也可见细致的个案、人物、事件解剖，论述和文字都显示出其求真存疑的严谨态度。在对新马社会三类中国观的全面、深入论析之后，鲁虎提出中国在战后新马内部发挥着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大影响，并且是新马历史外部动因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一结论是谨慎求证的结果，颇见说服力。

去年下半年，鲁虎对他的研究做了两次补充修改。在更新的论著里，他把论题调整为新马华人的中国观。这一调整使整个研究更为集中，各论述部分也更加平衡。为此，他对某些章节也作了新的安排。鲁虎补充了大量的最新出版资料，系统查阅一些旧报章，充实了研究论述，尤其是在中国观的建构和内容方面，如英国最高殖民官员麦唐纳的中国观和韩素音1956年访华即为新增部分，有助于更清晰展现当时的历史图景。修改后的文字表述也更为中性，原来通篇较多的用词如“新中国”和“英国殖民当局”等，需要处都注意作了相应的更换。

多年辛勤的研究，终能出版面世，这是一件值得欣喜、祝贺的好事。古人云：“学不可以已”。我期望鲁虎博士能够坚持不懈，更上层楼，为东南亚尤其是新马研究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座教授

2014年3月

序二

游俊豪

中国如此庞大繁复而恒常更替，所以任何对其某个单面进行单向的诠释，都势必将相关的话语与论述导入误区。无意的、有意的误读，极有可能对世界各国和各地社会产生震荡。二战后尤其如此，中国整体走出瓦解的危机，其国力逐渐升级变强，各国不得不认真衡量跟其关系，或拉远或靠近。而且，大量离散华人分布各国，他们的族群纽带与国族认同每每引发迷思，各国政府必须管治华族在国家结构当中的位置，或整合或融合。

鲁虎这部专书检阅地理上跟中国近距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论析了二战后20年间在地华人解读中国的各种尝试与角度，指出各种中国观的形成与传播带来了国家与族群认知方面的分野。

这份研究年份上限为1949年，下限1965年，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为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这过程当中，围绕着中国、中国性、华人性的诸多意象在折叠、分离着，如何被认知与接收非常重要。凭借另一新的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唤着境外的中国国族主义，涵盖面包括新马地区的离散华人。新马则脱离英国殖民主义而建立自己的国家，但两地对多元种族的排序各有相异的表述，政治终于走向分家。在国家与种族重组关系的时候，两地华人也在疏远着政治中国，并通过各种方式内化着中国文化、华人文化。

鲁虎的论著揭示，中国符号在许多管道中流动着。新马华人接到家乡故里的信函，读到中国出版的书刊，回到中国行旅与考察，收听中国电台的广播，借此拼凑中国图像。同时，新马的报刊、书籍、学校、社团、政党、政府也在筛选着中国的诸多信息。信息的

传播渠道与处理方式既然如此多元，中国观的建构当然产生差异。通过繁多的文本分析，并对一些走过那时代的人物采访，鲁虎归纳出中国观的三大面貌：新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崛起的亚洲大国。

“新中国”面貌，是离散华人里中国国族主义者的一道魅影，告别那传统封建而又兵荒马乱的中国，投奔新气象新希望的中国。“共产主义中国”符号，则有意识形态的分歧，左翼看待为“人民中国”，右翼、英殖民政府、马来亚政府却认为是“中国威胁”。“崛起的亚洲大国”坐标，在政治地理的视域里冲击强大，邻近各国必须重新调整区域的国际关系。

鲁虎来自中国，在新加坡求学教学多年。他的研究难得没有本质化有关中国的论述，而且对中国的多重符征与符旨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脉络合理而分明。尤有意思的是，鲁虎能埋首于故纸堆，触摸历史人物思想里的中国。陈祯禄、李光耀、陈六使、林连玉、李星可、林清祥、陈平，这些改变了历史也让历史左右的华人都再现于这本书里。鲁虎的研究揭示，这些重要人物如何认知中国种种，其实影响到新马族群政治的风潮、华文教育与文化的方向。另一特出的研究所得：马来亚致力磨灭中国烙印、新加坡容纳中国情结。

这部论著，在华人、中国、东南亚的重叠领域里，有其启示与解构意义。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副主任

2014年3月

自序

鲁虎

本书原是我的博士研究毕业论文，经修改后而出版成书。

看到自己多年投入的努力能够作为成果面世，我感到由衷的欣喜快慰。同时，内心也有如同新媳妇终将见公婆的惴惴不安。不过，在我心中最多涌起的是感激。本书虽由我独立写成，但时刻都离不开师友们的支持和促成。在此，我不再复述本书的内容要点，而是想借用这篇文章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因北京大学梁志明教授和张锡镇教授的推荐，我于2003年元月辞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长达近12年的东南亚研究工作，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国大提供的四年奖学金，让我得以安心完成修课任务和研究计划。再度的求学生涯，不但使我得到新的学术训练，而且给了我中国之外的长期生活经历。流动及身份改变带来的全新观察和思考角度，成为我这个人文学者成长中难得的资产。之前，我从中国的本位来研究东南亚，着重的是华侨华人历史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现在，我不但能够身在本地感知东南亚，而且渐渐开始从东南亚来回顾我的出发地中国。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思索，我决定把新兴趣点即新马社会的中国观作为研究选题，这也就是本书最初的缘起。

在国大期间，我尽可能多地选修和旁听中文系、历史系、东南亚系和语言中心的相关课程。新加坡交通便利，信息通畅，学者来往交流频密，各种演讲、讲座、研讨会常年不断。这种广听博取、集思求新的机会，我都尽量参加，一般每学期都参加十几次，多则20多次。国大图书馆馆藏东南亚资料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其

中的中文东南亚特藏和英文马来文新马特藏最为专家学者称道。我的功课和活动之外时间多数在图书馆度过，研究资料多半来自于这两大特藏，写作也基本在图书馆完成。2004年，我还得到国大人文社科学院的田野调查资助，赴英国剑桥、伦敦、马来西亚吉隆坡和中国北京，查阅档案和收集其他资料。

我最感幸运的是拥有刘宏教授这样一位博学多识、诲人不倦的指导老师。除了大课和研究生专题讨论课上细心教导外，刘教授对我研究的每一个进展环节都严格把关。他会根据日程表不断提醒，并定期与学生见面讨论检查。他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肯定进步，解析不足，并商定下一步的操作细节。本书无论是研究选题、思路提炼，还是论述结构、文字写作，都随时得到刘教授的专业指导。刘教授对学生一贯的信任和激励，使我在疲累时不敢懈怠，困顿时不想放弃，而是鼓起干劲，迎难而上，日求有进，坚持而成。2006年下半年，刘教授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担任中国研究所创建所长，但仍额外抽时间几次审阅修改稿，辅导我完成整个研究。同样幸运的是在本书出版时能请刘教授为本书作序，为我这一研究再作一次指导。

刘宏教授离开国大后，李志贤副教授继任我的导师。他耐心、细致指导我后期的研究工作，并带着我走到了论文答辩和毕业典礼。研究指导委员会的郑永年教授、韦杰夫(Geoff Wade)高级研究员和杨军副教授，都热心、尽力为我的研究提供建议和指导。校外评审杨保筠教授提出了全面而独到的审阅报告。黄贤强副教授和何启良教授在我论文答辩中的专家意见，为我日后修改指出了难点和重点。

万分荣幸的是我的研究最终能被新跃大学中华学术中心列为《新跃人文丛书》之一出版。中心特请专家审阅书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在百忙中通读全稿，两次面谈给出详细、具体的修改建议，让我受益不尽。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博士不仅最先提议本书的出版，而且始终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帮助。中心还给我提供了一段时期的兼任研究员职位，让我在半年内能集中时间对书稿进行两次大的补充修改。中心对中华文化研究项目的鼎力推动及对研究学者的真诚提携，使我让研究成书的愿望得以成为现实。

东南亚和华人研究专家游俊豪博士古道热肠，爽快接受我的请求为本书作序。他在任的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我提供了大力的协助。这也让本书的最后修改更为顺利完成。

我在此还要感谢新跃大学中文课程主任罗福腾副教授。他接纳我为中文课程教学团队一员，使我能在博士学习毕业后保留在教研的轨道上，并一直保持着学术探索的兴趣和劲头不减。他对本书的修改和出版同样倾注了不断的关切和支持。

本书是我为学人生的一个阶段性报告。研究出书之后虽觉欣慰，却并不会感到轻松，唯恐因才学所限有诸多欠缺不周之处。恳切期望各位学友和专家不吝惠正和批评。相信你的支持是我完成研究的保障，也将是我继续走向下一站的动力。

2014年3月

SUMMA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ingapore/Malaysia and China from 1949 to 1965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perceptions of China within these Southeast Asian states. Bo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experience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resulted in their traditional interactions also changing accordingly. The flow of migrants, investment, goods and printings greatly declined. However,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sides not only continued, but also assumed an unprecedented vitality.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concepts, which had already been occurring in the pre-war period, came to be the main form of interac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variou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China became a prominent element of such phenomena. Through correspondence, books from Hong Kong, a few field visits and the new media such as radio, much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arrived. Chinese newspapers and schools, governments,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me writers represented and disseminated various images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perceptions was a selective process due to the Cold War and local nation-building agendas. The banishing of Leftists to China also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China as the Other vis-à-vis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diverse perceptions of China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main groups. The idea of "New China" was created by the leaders of Chinese communities, concerning themselves with the social progress which China had achieved. The perception of "Communist China" was concerned with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 the Leftists lauding "People's China" as their model,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ts criticizing it as a "Communist threat". Those who saw China as a "Rising Asian Power" considere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Asian neighbours, paying balanced

attention to the various changes in China,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The presence, changes and conflicts of these perceptions of China were internalized as dynamic forces, influencing to varying extents racial relations, political evolu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foreign policy and even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in 1963.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were thus raised to a higher stage, as the reaction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owards China was extended from simply percep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involve the whole country. Due to historical links, racial proportions and relative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osted perceptions of China of much greater varieties and complexity, if compared to other Asian countries. Eve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once parts of the same political entity, had different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Malaysia tried to eliminate any presence of China, while Singapore showed more tolerance towards the grassroots' affection for China. In addition, Singapore refused to accept the discourse of equating Chinese persons with the Left or with China. This thesis also suggests new understandings of the role of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post-war history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and social experiments in China attracted interest and discussion from nearly all social classes and racial groups. The presentation of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various perceptions of China resulted in China, though far away, being drawn into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d playing a role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expected. China was thu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the post-war years.

摘要

本书研究1949到1965年期间新马华人的中国观，旨在考察新马与中国两地的互动变化。这一期间中国和新马都经历政治巨变，引发两地之间近百年来传统互动模式的改变。外交、移民、投资、货物、书刊等方面的交流，与1949年前相比明显减少。然而新马中国的互动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显示出其前所未有的活力。战前已经存在的思想观念的交流，这时期上升为主要的互动方式。从新马来看，各种类型的中国观的出现和冲突成为这一现象的突出表征。通过书信往来、香港出版物、为数不多的实地访问以及新型的电台媒体，新马仍然可以获得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华文报刊、学校、政府和左翼团体以及一批作家，都在各自呈现和传播中国的形象。新马在探索民族国家的道路，冷战造成亚洲国家对立，使中国观的建构成为有意识选择的过程，而把左翼人士驱逐出境到中国的解决办法，则使中国突出为新马社会的他者。新马各种各样的中国观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型。“新中国”观由新马华人社群所呈现，关注中国的社会进步。“共产主义中国”观只注重中国变革的政治意义，其中左翼理想化地称颂“人民中国”，而官方和右翼则把中国宣扬为“共产主义威胁”。“崛起的亚洲大国”观主要从亚洲邻国相处角度来考虑，注意到中国进步的事实，但也发现中国存在的制度或政策性问题。各种中国观交错纷呈，相互作用，内化成为促成新马变革的动因，对新马的族群关系、政治演进、文化融合、对华政策甚至国家组成形式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时期新马中国间的互动因而已经迈向了更高的层次。新马对中国的反应开始由局部转变为整体，由华人扩大到所有族群和整个国家。历史联

系、族群比例和对外的相对开放，决定了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新马对中国的认知可能更为复杂多样。同时可以看到，虽然新马自视为一家，但两者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存在差异。马来亚极力消除中国的任何存在痕迹，而新加坡更多容忍民众对中国的好感，也不接受把华人等同于左翼和中国的论述。对新马中国观的历史研究，还有助于重新审视这段时期中国对于新马的意义。中国变革的冲击跨出华人社会，上升为新马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突显为新马外部关注的一个无可回避的重点。各种中国观的存在和冲突，使得遥远的中国在新马内部发挥着远比人们想象更大的影响。中国一方面被新马他者化，另一方面又实际上进入了新马内部。在新马战后历史的外部动因中，中国也许不是最重要，但却明显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